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思想源泉与实践路径

薛 力 苗蓓蕾

【内容提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领导人为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而提出的中国答案，其主要思想源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以及道儒法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下，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新型国际关系是实践路径，“一带一路”是合作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种理念、方略与政策，也正是构建全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现，体现在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不同领域，以及双边、区域、全球、功能议题等四个层次。

【关键词】 文明新形态 思想源泉 新时代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 薛力，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苗蓓蕾，重庆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DOI:10.20018/j.cnki.reecas.2023.06.001

过去两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论述“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第一次论述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第二次论述是：“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②那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精神源泉具体是什么？人类文明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1年第14期。

^②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新形态的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什么关系？新时代中国外交呈现了什么特点？

一 逻辑框架与概念间关系

认真研读上述讲话、十九大以来的关键文献^①以及学者的相关研究^②，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以此形成本文的逻辑框架。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人类文明新形态发生于中国这块土地，从精神与物质上服务于中国人民，是中国梦与中华文明复兴的首要内涵，构成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国内基础。其次，作为四大文明中唯一赓续了五千年、正处于复兴进程中的主要文明体、一个巨型市场，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必然越来越多地影响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也接受来自周边与世界的影响。

我们将在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新时代外交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包括宏观层次的总体目标、中观层面的外交方略、微观层面的政策措施。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宏观层次展示新时代外交的核心理念、总目标与顶层设计，包括五大领域与四个层次：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五大领域大致上对应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五个领域；四个层次是全球、地区、双边与功能议题。全球层次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地区层次即中国与某个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双边层次即两个国家之间，如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功能议题层次聚集某个功能或者议题，如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领域划分与层次划分均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观理念的操作化。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

② 孙代尧：《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韩喜平、郝靖智：《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1 年第 4 期；王岩、吴媚霞：《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理路》，载《思想理论教育》2021 年第 11 期；田心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 年第 11 期；杨宇、杨瑞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形态意蕴探赜》，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2 年第 6 期。

新型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位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中观层次，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与合作平台。而不同类型、层次的伙伴关系的建构与升级，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以及具体项目的实施，则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微观层次。从领域的角度看，伙伴外交主要聚焦政治与安全两个领域，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外交。在与发达国家的外交中侧重于构建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而较少使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主要聚焦经济与文化领域，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则，构成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52个国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所涉及的大部分也是发展中国家。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伙伴外交，它始于构建中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并扩展到一般国际关系，而且越来越强调“公平正义”的内涵。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分别从经济、安全与文化三个领域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构成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在相关领域的升级版。全球发展倡议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领域，重点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可视作“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领域的升级版。它对接联合国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全球正当性。中国倡导以综合、共同、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它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领域，可视作伙伴外交在安全领域的升级版，也是2014年亚洲安全观的全球版。全球文明倡议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领域，可视作“一带一路”在文化领域的升级版，以四个“共同倡导”为核心理念。

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在地理范围、人口数量、经济规模都非常庞大的国土上，复兴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是一项没有先例可循的巨大挑战。当代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自身历史积淀、外来历史影响、自身经验与现实需要中，通过扬弃去芜存菁，倡导新理念，并用于新的内政外交实践，这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现实的必然性。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过去一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诸子百家则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源头与主要内涵。“第二个结合”指出要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贯通起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长点，找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点，使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使我们能够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观念、体制、制度等创新^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也指出：“第二个结合”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②。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思想。马克思的国际观诞生并形成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及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对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发展及其变迁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③，也指导和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政治思想与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第三、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

1.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国际关系，其国际观和世界观集中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采用严谨科学的辩证哲学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世界历史发展和国际社会变迁的观点，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主要包括“自由人的联合体”理想、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以及对列强政治的剖析。

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科学社会主

① 辛向阳：《“第二次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 6 月 8 日。

② 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载《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3 日。

③ 姜安：《马克思的国际观及其当代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1 期。

义原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为基础，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果，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创立了唯物史观，进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揭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①。科学社会主义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未来共产主义的文明形态，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私有制被彻底消灭，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部资料，社会成员各尽其能，生活资料按需分配；人对人的剥削消失后，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随之消失，民族融合，世界一体；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阶级差别和重大社会差别被消灭，没有国界的限制，也没有等级的分别；人与自然也达到真正的“和解”。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其特色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③，这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精神相贯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继承和发展了“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遵循，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标，以实现全人类发展、繁荣和幸福为宗旨，蕴含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前瞻性思考和对人类进步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④。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马克思一直在追寻世界和平的基本实现途径，反对帝国和殖民战争，在马克思的思想世界中，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战争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受国际分工与世界交往、世界市场与国际贸易、私有制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各国对外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战争与和平作为一对矛盾体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对人类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马克思在考察世界战争冲突史的基础上，将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明确表达了对帝国之间

① 王怀超：《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23页。

④ 徐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人类进步的伟大理论创新》，https://cn.chinadiplomacy.org.cn/2022-03/15/content_78110029.shtml，访问时间：2023年6月6日。

战争、资产阶级战争、帝国殖民战争的批判和谴责^①。

正如马克思一直在追寻世界和平的基本实现途径，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届中国领导人都在孜孜探索世界和平的实现路径，从建立“和谐世界”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为解决全球安全赤字问题而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都展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而对于霸权政策和强权政治的批评与谴责，也贯穿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实践中。

对国际关系不平衡性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也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国际关系的不平衡性。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对英俄外交关系、西方列强与落后国家关系等进行的针对性分析，指出西方列强密谋牺牲弱国的土地和权益而满足本国扩张胃口的实质^②，认为列强的战争政治是国际秩序动荡和冲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强烈批判西方列强向世界各地推行的殖民战争政策，并赞叹落后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③中的分析也表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战争和剥削，完全是基于资本逻辑催生的殖民扩张意志、虚假的战争借口以及列强之间的内部交易。

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道德和正义是马克思处理和解决国际关系的基本伦理准则。他始终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依据大量外交公函、官方文件和议会纪录披露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弱国、小国的殖民和剥削。这种尊重正义和公平、尊重世界各国民族生存和主权平等观念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国际观和世界观。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再到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中体现的公正与客观一脉相承。

2.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发展，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国际观和世界观，其

① 姜安：《马克思的国际观及其当代价值》。

②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26 ~ 842 页。

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平与发展”时代观和“和谐世界”理念都对世界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国际观和世界观。1949年10月以后，中国作为新生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正处于国际社会两极冷战格局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洞察国际关系的变化情况下，以维护国家权益和人民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在之后的国际舞台上，中国一直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与外国关系的外交准则，尤其是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交往之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基本权利要求，具有国际合法性和公正性，历届中国领导人的国际观和世界观中都从不同程度与不同方面展示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随后，毛泽东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外交领域，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从“一个中间地带”理论向“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演进，最终形成以“三个世界”划分为基础的国际观^②。“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苏是世界两大军事政治力量中心，“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论断既指出了资本主义殖民国家与亚非拉被殖民国家之间的矛盾，也直击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新中国在发展对外关系上更大限度地团结了国际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的反霸权主义战略也获得了更多的力量支持，对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坚持的“平等互利”原则、以及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也为之后中国历届领导人所承继。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讲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

^① 1954年中印政府签署的文件中正式使用五项基本原则，即“双方同意基于（1）互相尊重领土主权，（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惠，（5）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经过中国与印度、缅甸三国政府的大力提倡，把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自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固定下来，成为中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② 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而“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①。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代表的“团结大多数”理念，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战工作，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过程中积极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并与联合国成员国中的 79%（152 个）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国际观和世界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迈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战略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③，“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④。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结合当时国际局势，就时代主题作出的重大判断^⑤。基于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判断，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或者叫联合与合作”^⑥，积极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安全的维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邓小平还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方针，引导中国潜心耕耘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对发展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保持清醒的认识。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延续到现在，睦邻友好的周边政策依然有效，并演化为新时代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政策。中国历届领导人集体在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等的观察基础上，继续坚持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认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同时，他们也充分认识到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又在“和平与发展”基础之上提出了“合作共赢”“和谐世界”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6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5 页。

④ 同上，第 249 页。

⑤ 尚伟：《中国外交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践行与创新发展》，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 年第 2 期。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5 页。

在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和平，而“一带一路”则继续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这一系列理念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第三、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国际观和世界观。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中正式将“建立新秩序”定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对新秩序的内涵也作了系统阐述：“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①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专门用一段来阐述建立新秩序问题。“建立新秩序”这一观念摒弃冷战思维，主张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不断深化，为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推动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进入新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快速发展、与世界经济关系更为紧密，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关系重大。为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2005年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②。“和谐世界”是中国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方面的外延。2005年12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所包含的四个内涵：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③，表明中国实力的强大将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国际社会“建立新秩序”，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和谐世界”。因此，“和谐世界”成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外交实践的指导思想，指导着中国不断提高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程度，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和谐世界”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既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时候对国际大势的深刻思考，也包含着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④。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谐世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和谐世界”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② 胡锦涛：《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 构建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年4月23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3日。

④ 秦亚青：《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新理念》，载《前线》2006年第12期。

思想的基础上扩大了内涵与外延,更深刻地展现出中国作为“有为大国”将对整个世界前途承担起相应责任。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优越。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①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②。可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多任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的理念并延续至今。

(二) 文明新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其中的道家、儒家、佛教和法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建设国家的实践以及对人类世界的构想。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主干),这是中国文史哲研究界的主流认知,但就国际关系而言,佛教的影响比较小,本文略而不论。而法家则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治理提供操作化的理念与工具,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当今中国的外交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道家源泉及其时代化。道家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兼及社会与国家的顺势治理。鲁迅提到,“中国根抵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③。李约瑟认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这些树根今天仍然生机勃勃”^④。在道家看来,“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互相转化,世间万物都应该“道法自然”,人显然也是如此。因此个人应该修身养性而达于天人合一,而君王治理天下时应该合于道,以此为圭臬,“无为而无不为”^⑤,也就是说:(1)合于道者无不为,因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⑥,治理天下应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⑦。(2)不合于道者无为,即无为而治,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7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50页。

③ 《鲁迅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④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何兆武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⑤ 《老子》,饶尚宽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1页。

⑥ 同上,第153页。

⑦ 同上,第155页。

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①。道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典型如老子认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②，这是一种豁达、利他的心态。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③则展示了胸怀广阔、容纳万物的心境。习近平外交思想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④，以及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等，均体现出豁达利他、容纳万物的思想与心态。

儒家源泉及其时代化。儒家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儒家理念因而成为中国人构建人际关系、治理国家与天下所凭借的主要价值观。“礼表仁里”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它是关系本位而非（基督教文明那样的）个体本位。“仁”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意味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张“和而不同”并注重相处过程中彼此的“舒适度”，而不是像基督教文明那样“区分他我、强调对立”。“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礼”经常与“仪”合称“礼仪”或者“仪礼”。两者关系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观察。《史记·礼书》云：“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⑤，这是基于横向视角从感性与理性两方面分析礼与仪的来源。从纵向视角看，“仪”是“礼”的操作化，两者均强调节制与分寸感^⑥。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世界的构想。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⑦。

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强调“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⑧，“要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以负责任态度作出明智选择”^⑨，这

① 《老子》，饶尚宽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8页。

② 同上，第18页。

③ 同上，第20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

⑤ 司马迁：《史记》（第四册·卷二十三·礼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57页。

⑥ 薛力：《文明竞合I 新型礼治秩序：文明竞争长周期下中国外交长期方略》，澎湃新闻-外交学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78972，访问时间：2023年5月6日。

⑦ 《礼记》，胡平生、张萌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19页。

⑧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5日。

⑨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是“天下大同”与“天下为公”思想在当代的生动实践。儒家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①，当代中国外交则强调“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②，“把‘和’、‘合’的传统理念付诸彼此相处之道”^③。儒家坚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习近平则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⑤

法家源泉及其时代化。整体上，历代王朝都意识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⑥，即强调治理天下时要儒法结合。中国的法家始自春秋时期的管仲和子产，被战国时期的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子等人发扬。此后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法家思想，在强调礼治的同时重视法治的功能与作用。从哲学层次上看，儒家属于“道”的层次，而法家属于“用”的层次，因此用“儒表法里”概括中国文化是不准确的。但就天下治理而言，采纳法家思想是必然的。法家的核心主张是富国强兵，为此高度强调“任法不任人”^⑦，以体现法治的一致性与强制性，因此法家与儒家、道家构成互补关系。

管仲首倡“以法治国”，主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⑧，“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⑨，“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⑩。子产首倡将法律公布于众，打破了士大夫“不为刑辟”的惯例。商鞅力倡“明分止争”^⑪，旨在明确人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因财产所有权不清而导致纷争。韩非子主张“法令行而私道废矣”^⑫，认为法令一旦颁布，君、臣、民都必须尊法，只有如此才能国富兵强、国治民安。总之，法家注重“以法治国”，认为“法令废私”，因

① 《论语》，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99 页。

②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34 页。

③ 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5 年 11 月 8 日。

④ 《孟子》（尽心下），万丽华、蓝旭译注，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24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9 页。

⑥ 《唐律疏议》，岳纯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 页。

⑦ 王夫之认为，古代王朝治理天下的问题是片面强调法治，轻视人治，其原话是，“治之弊也，任法而不任人”，参见〔清〕王夫之：《读通鉴论》，舒士彦点校，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139 页。

⑧ 《管子》，李山译注，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5 页。

⑨ 同上，第 237 页。

⑩ 《管子》（任法），李山译注，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241 页。

⑪ 《商君书》（定分），石磊译注，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206 页。

⑫ 《韩非子》（诡使），陈秉才译注，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45 页。

而强调立法和执法的权威性。

新时代中国强调依法治国，赋予古代法治思想以新的含义。习近平曾引用《韩非子·有度》中的“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①来表明法律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②。主张人人知法、懂法，法需要传播、解释与普及。他引用“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③并解释说，使法必行之法就是弘扬法治精神^④。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⑤。

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外交：顶层设计与外交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首创“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紧密结合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又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传统；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要针对国内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针对国外的“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对内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新的公共产品，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大国担当与大国作为。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系列理念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新型国际关系是实践路径，“一带一路”是合作平台。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

2012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也成为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端。这一判断有助于我们集中论证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特色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就国际背景而言，冷战

① 韩非：《韩非子新校注》上（有度），陈奇猷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19年第18期。

③ 《商君书》（画策），石磊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2页。

④ 公丕祥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法治篇》，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

⑤ 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23日。

结束后的欧洲，苏联与华约都已不复存在，但北约不但没有解散，反而违背对戈尔巴乔夫的承诺，不断东扩并把俄罗斯当作必须打压的对象。在东亚，美国继续维持乃至强化其“轮轴—轮辐”式军事联盟体系。冷战后特别是 2008 年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以来，实力相对衰弱的美国自信心下降，逐步将中国确立为“全球战略竞争对手”。它既希望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又希望盟友与紧密伙伴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全球性环境问题和世界范围内的疫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为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美国所代表的国际关系“旧思维”无法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并加强了文明体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这与基督教文明强调二元对立的固有限制密切相关。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世界都在询问：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新时代中国的回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崛起中的中国基于自身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力主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解决争端，为全球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倡导并践行多层次、多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从而推动构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指明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五方面内涵。政治上，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安全上，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经济上，坚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优越。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文明为依托，结合近代以来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经验，吸取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积极成果而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道德主张，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构成中国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端，并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互相促进。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是中国构建全球文明新形态的展示，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系列理念、策略与政策实践。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71 ~ 278 页。

（二）新型国际关系是实践路径

2014年，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①这是“新型国际关系”概念的首次提出，其内涵可概括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②。“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鲜明的中国外交特色与时代特征，核心是“合作共赢”，合作是路径，共赢是目标。合作共赢理念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是通向和平与繁荣的道路。

大国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处于关键位置，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必须面对的重要一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超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抛弃“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更正“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避免并克服旧有大国关系中互不信任、相互排斥、相互为敌的消极因素，增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追求合作共赢，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健全风险管理机制，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输入正能量^③。

推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则是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落脚点。与基督教世界热衷于“结盟对抗”不同，中国主张在外交上“结伴但不结盟”。缔结军事同盟的本质是零和思维，因为军事同盟总是存在着“战略对手国”乃至“敌人”。但“结伴”则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将合作共赢作为目标，符合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国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建设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伙伴意味着一个好汉三个帮，一起做好事、做大事。”^④王毅认为，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同时，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中国仍会坚持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立场，作出自己的判断^⑤。中国的伙伴外交始于1993年。十八大前中国已经与57个国家与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十八大与十九大之间，中国在推进伙伴外交上提出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新目标，与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截至2023年11月9日，

①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30日。

②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③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54页。

⑤ 《中国外交丰收之年》，载《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5日。

中国已经与 118 个国家、6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发展形成 124 对伙伴关系^①。可见，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经覆盖全球大部分国家。

(三) “一带一路”倡议是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由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在 2013 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的简称^②。“一带一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相关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一带一路”强调“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特别是互联互通。2021 年中国领导人将“五通”进一步概括为“新三通”即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各国民众的“心相通”，以及“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共建新目标^③。截至 2023 年 6 月，中国已经同 152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④，“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涉及多个领域的合作，但重点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以及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为全球所公认，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全球比较优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⑤，发展问题依然是时代主题，而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雷声大雨点小”，对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援助往往附加种种条件。美国和西方轻易地忘记了自己的发展历史，以发达国家的眼光与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绑架，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很清楚，很多问题都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这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的原因。截至 2022 年 6 月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积约 12 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 1 400 亿美元；截至 2021 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累积投资 430.8 亿美元，为当地

① 依据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席寒婷的统计，资料来源：外交部网站、商务部网站、中国政府网等。

② 习近平：《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87~291 页；习近平：《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92~295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95 页。

④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访问时间：2023 年 6 月 23 日。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96 页。

创造了 34.6 万个就业岗位；截至 2022 年 8 月底，中欧班列累积开行近 6 万列，货值累积近 3 000 亿美元，共铺画了 82 条运输线路，通达欧洲 24 个国家 200 个城市^①。

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带着有色眼镜看“一带一路”，以没有事实支撑的“债务陷阱”等话语构陷中国^②，对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施加或明或暗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推出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与中国竞争，如安倍政府 2015 年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③，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④，七国集团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⑤。全球基建需要的资金缺口巨大，中国欢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加大投入。但主导国际话语权的美国和西方持续给“一带一路”制造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中国政府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其中之一就是与联合国的相关议程对接。

因此，中国在 2021 年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2022 年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2023 年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上也积极展现大国担当与作为。

全球发展倡议的主要内容是“六个坚持”，它对接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⑥，具有全球正当性，旨在应对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扩大等问题。全球发展协议坚持普惠包容，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指明了一条公平的道路，取代了原有的核心国家剥削外围国家而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旧的全球发展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容包括“六个坚持”^⑦，是对以往安全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安全领域的飞跃，为破解全球安全赤字贡献了中国方案，

① 《共建“一带一路”九周年成绩单》，<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281310.htm>，访问时间：2023 年 5 月 26 日。

② 引自作者 2023 年 7 月 28 日对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必亮教授的访谈，这是作者“一带一路十周年”系列访谈之一。依据他的研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所欠中国债务，不会超过其债务总额的 20%，而由“一带一路”建设所形成的债务占比更少。

③ 《安倍内阁总理大臣在第 21 次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晚餐会上的演讲》，https://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505/0521speech.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5 月 26 日。

④ EU's 'Global Gateway' Infrastructure Push Offers Counter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11-30/eu-eyes-300-billion-euro-infrastructure-push-to-challenge-china#xj4y7vzkg>，访问时间：2023 年 5 月 26 日。

⑤ G7 Rivals China with Grand Infrastructure Plan. <https://www.reuters.com/world/g7-counter-chinas-belt-road-with-infrastructure-project-senior-us-official-2021-06-12/>，访问时间：2023 年 5 月 26 日。

⑥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共同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座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zzyjh_674906/202112/t20211209_10465870.shtml，访问时间：2023 年 5 月 26 日。

⑦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2 日。

也展现了中国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为“安全困境”“修昔底德陷阱”^①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也是对“中国威胁论”^②和“金德尔伯格陷阱”论^③的有力反驳。

全球文明倡议包括四个共同倡导^④，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于世，不追求取代与效法历史上的崛起国（无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必要重新构建基于自身价值观的礼治秩序。全球文明倡议的实现不仅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担负起大国责任，更需要世界不同文明国家一起共同担负起全球责任与人类文明使命，虽然每个国家承担责任的能力有大小。

中国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首批缔约国，不仅积极参与了 2015 年《巴黎协定》的谈判和签署以及日后的各种履约会议与机制政策制定，而且努力将它的核心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在 2019 年 9 月举行的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峰会上，中国提出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相关议题获得与会各国的广泛认同，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重视自然途径，并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NDC）以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进程中^⑤。

结 语

文明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延续性，只能在已有的历史积淀、文化基础上进

①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② John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10, pp. 381–396; Christopher Walker, “What Is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9, No. 3, 2018, pp. 9–23; Joseph Nye, “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 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 Access time: Jun 11th, 2023.

③ Joseph S. Nye, JR, *The Kindleberger Trap*, Jan 9, 2017. Project Syndicate, The world’s Opinion Pag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 Access time: Jun 11th, 2023.

④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6 日。

⑤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的中国贡献》，<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19/0925/c1002-31372850.html>, 访问时间：2023 年 5 月 26 日。

行^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来源广泛，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借鉴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是基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而形成的文明形态。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正是构建全球文明新形态的过程，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观层次的顶层设计，中观层次的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微观层次的伙伴关系建立、“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签署、各种项目的落实、参与各种生态治理实践等。

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各个文明间的包容、交流、互鉴，反对西方文明那种自认为高人一等、“自己的今天就是别人的明天”的“文明优越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逐渐崛起，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精神成果的影响外溢，为中国主张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基础，并体现在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中，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新型国际关系是实践路径，“一带一路”是合作平台。这三者相辅相成，为新时代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提供了目标和路径指导，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国对中国的认识，愈来愈多的国家意识到中国方案与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带来不同于西方的、崭新的形态，也必将引导未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方式。

中国外交经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期以及邓小平主张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阶段，现阶段中国外交已经到了“奋发有为”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顶层设计到外交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在全球问题解决上的贡献与力量。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一种全球文明新形态。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生态各个方面致力于为全球问题找到新路径、新办法，这些正是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外溢的体现，展示了中国自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在世界文明新形态构建中日益提升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陈金龙、蒋先寒：《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由来、特征与价值》，载《学术研究》2021年第9期。

SUMMARIES

A New Model for Human Progress and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deological Sources and Practical Paths

Xue Li and Miao Beilei

The New Model for Human Progress (NMHP) is the Chinese answer proposed by Chinese leader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ere mankind is going. Its main ideological sources include the Marxist international outlook and world view, Chinese Marxism international outlook and world view,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Under the concept of NMHP,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major –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goal,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the practical path, and the “Belt and Road” is a cooperation platform. The various concept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re also manifestations of building a NMHP. They are reflected at different levels such as macro, meso and micro, including politics, security, economy, culture, ecology and other different fields, and four layers: bilateral, regional, global, and functional issues.

Key Words: New Model for Human Progress (NMHP), Sources of Thoughts, New Era, Chinese Diplomacy

The Regularities of Period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Leaders and Its Impact on the World Structure

Sergey Glazyev

According to the long – term theory of glob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change in world economic mode, the forma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pole” of the world economy changes periodically. At present, a new type of global economic mode is being formed: an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ic mode. There are three specific types of this new mode: communism,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The new world order will be formed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hree – mainl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first two because the global hybrid war launched by the American ruling elite will be doomed to failure. The new integrated world economic mode will produce a bipolar core: communist China and democratic India. At least since the 17th century, Russia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pole with world influence, but to get rid of its current marginal posi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Russia must completely adjust its economic policy and implement an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new technologies. With the end of the global hybrid wa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ATO, etc.) 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maintain its hegemony will rapidly fade. The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ic mode has restore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based on sovereignty, which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of geopolitical